

中国现代文学与 儒家传统(1917-1976)

本书以独到的问题意识为纲，讨论了儒家传统在1917-1976年间中国文学中的存在状态及发生影响的方式。全书从现代文学的三个基本层面，即结构论（时间想像）、主题论（意义建构）、形象论（“个人”叙述），讨论了儒家文化在其现代性的发生、形成及变异中的影响和制约。



中山大学中文系
学术文丛

张均 ◆ 著



岳麓书社

I206.6/158

2007



中山大学中文系
学术文丛

中国现代文学与
儒家传统(1917-1976)

张均◇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张均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7

ISBN 978 - 7 - 80665 - 878 - 9

I. 中... II. 张... III. 儒家—影响—文学—中国—
1917—1976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311 号

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

作 者:张 均

责任编辑:王德亚

特邀编辑:李传书 喻名乐

封面设计:山和水工作室 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0.12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 - 7 - 80665 - 878 - 9/I · 790

定价:26.00 元

承印: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文丛”

出版说明



中山大学前身为广东大学,由孙中山先生手创于一九二四年,中文系则是当年同时设立的系科之一,至今已走过八十年的风雨历程。现在的中文系,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八个二级学科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博士后流动站、两个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和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一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古代戏曲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并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诸多大学保持密切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关系,同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等地多所大学的学术交往更是十分频繁。

中山大学中文系人才荟萃,曾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里任教,早年有鲁迅、郭沫若、傅斯年、郁达夫、成仿吾、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晚近有王力、岑麒祥、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起、黄海章、楼栖等。大师们的工作,为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经过几十年的薪火相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系教师与时俱进,以继承、开拓、创新为己任,呈现出人才辈出、学术精进的大好局面。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因此,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中山大学名列其中。

乘着我校实施“985”工程的东风,中文系特地组织一个大型“985”项目:编纂并与岳麓书社合作出版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文丛”。丛书所收入的,有我系已故前辈学者的遗著,也有退休老教授的杰构,更多的则是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力作,乃至优秀博士论文。这些专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文系的科研实力和水平。我们相信,随着这套文丛的出版,我系又一批后辈学人会跃上新的学术台阶。

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文丛”编委会

二〇〇四年四月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是张均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专著选题好，让人眼睛一亮，有意义。但要做好，却不容易。张均自己一直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考虑用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我给了他鼓励与支持。我感觉到当前置身于建构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的言说困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而这项有关传统资源的研究，应该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论文出来了，我很满意，有些高兴，有些欣然。

这本专著主要讨论的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儒学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七六年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出于文学现代性内涵复杂，自身包含着多重交关联的命题，张均选取了其中结构、主题和形象三个重要的层面予以考量。他讨论问题的思路特别清晰，这大概得益于他曾经在武汉作为工科学生的经历。他通过对各个层面内现代性架构的源起、发生过程的辨析，以及对儒学质素在这些架构中的存在状态的清理，建构了一个新颖独特的阐释框架。张均不喜欢重复别人。他很熟悉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但他讨论的问题与以前的学者很不相同，比如论文基本上没有讨论现代文学中儒家新“载道”的传统，他希望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打开自己的言说空间。论文的优点因而也就比较明显：一、它深入揭示了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关联，打破了近年来流行的将中国现代性直接等同于仿效、移植西方性的观念，细致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构



序

001

架在西方与传统中国文化、社会现实问题发生的纠缠与互动中完成自身的过程;二、在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本书还从现代的末世拯救的时间观念出发,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解成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并梳理了传统儒学在历史叙事与非历史叙事发生与展开过程中的规约作用,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及相应的现代“症候”,作了别开生面的解释;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农民想像问题的分析,相当新颖深刻,它认为以阿Q为代表的现代农民形象主要不是作家从现实主义真实性角度出发塑造出来的,而是知识分子根据自身人格的实现逻辑叙述出来的。这些论述是敏锐的,有着独特的理论眼光。我未必认同他的所有看法,他的一些结论可以继续讨论,但对于他的眼光,他的问题意识,我是赞赏的。

张均是我的学生,我对他的了解较多。第一次见他是在博士生面试的时候,当时他回答问题态度很老实,言语不多,多少有点第一次见师时的紧张。但一谈问题,就忘记了紧张,眉毛时而一扬,就扬出了智慧。他的智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进校了,接触多了,我发现他不但在学术上很有钻研的韧劲,在现实生活中,为人也是厚道的、正直的。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他很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这可能与他出身农村、耳闻目睹比较多的社会现实有关。我认为这是一种在今天社会已经不多见的可贵素质。他待人接物也是善良的,善良得不但没有害人之心,连防人之心有时也没有。现在他已毕业留校好几年,成为我的同事。我希望在南方这样一种学术环境里,他能更多更快地汲取多方面的学术营养,做出更具创造性的学问来。

在来中大之前,张均曾在武汉大学学习三年,已经发表了不少论文,现在这本专著的付梓,可算是他多年求学的一份沉甸甸的收获。我很高兴,既高兴他在学术上的进步,也高兴有这样的学生。

是为序。

程文超

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三日



序.....程文超(001)

绪 论 我们是如何成为“现代”的.....(001)

第一节 现代文学的文化渊源.....(003)

第二节 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010)

第三节 “儒家传统”辨析.....(015)

第四节 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的关联方式.....(019)

上 编 结构论 现代文学的时间想象与儒家传统.....(023)

第 一 章 时间问题与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025)

第一节 “历史”的概念.....(026)

第二节 现代文学对历史的接受与建构.....(030)

第 二 章 五四文学的时间想象与儒家传统.....(033)

第一节 历史接受与文学现代品格的形成.....(033)

第二节 儒家传统对五四时间叙事的渗透.....(044)

第 三 章 现代历史叙事的时间想象与儒家传统.....(059)

第一节 历史叙事形成的理论背景及其结构.....(059)

第二节 儒家传统在历史叙事中的渗透与深入.....(069)

第 四 章 现代非历史叙事的时间想象与儒家传统.....(081)

第一节 非历史叙事的发生契机及基本机制.....(082)



目
录

001

第二节	儒家(传统)资源在非历史叙事中的转化·····	(096)
中 编	主题论 现代文学的意义建构与儒家传统·····	(109)
第五章	从境界到历史·····	(111)
第一节	现代文化从德性到幸福的价值转型·····	(111)
第二节	现代文学从境界到历史的意义转型·····	(114)
第六章	现代苦难叙事与儒家传统·····	(118)
第一节	苦难叙事的形成及其结构·····	(119)
第二节	苦难叙事中的儒家传统·····	(124)
第七章	现代忏悔叙事与儒家传统·····	(146)
第一节	西方语境中的忏悔叙事·····	(146)
第二节	儒家思想对现代忏悔叙事的影响·····	(150)
第八章	现代性爱叙事与儒家传统·····	(168)
第一节	身体上的历史·····	(169)
第二节	儒学与现代性爱的话语转移·····	(182)
下 编	形象论 现代文学中的“个人”叙述与儒家传统·····	(195)
第九章	个人想象的现代转型·····	(197)
第一节	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	(197)
第二节	信仰历史的现代公民·····	(199)
第十章	五四文学中知识分子自我想象与儒家传统·····	(202)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	(203)
第二节	儒学与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矛盾·····	(208)
第十一章	革命叙事中知识分子自我想象与儒家传统·····	(220)
第一节	思想改造的背景与文化认同的调整·····	(221)
第二节	思想改造的发生与儒家人格模式·····	(224)
第三节	思想改造的展开与儒家道德内省机制·····	(232)
第十二章	五四文学中的农民想象与儒家传统·····	(240)
第一节	农民被想象的两种方式·····	(241)

第二节	启蒙主义对农民的讲述·····	(243)
第三节	儒家传统对农民想象的渗透·····	(260)
第十三章	历史叙事中的农民想象与儒家传统·····	(271)
第一节	农民想象的基本方式·····	(272)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人”的儒家建构·····	(277)
结 语 资源意识与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91)
主要参考书目·····		(301)
后记·····		(308)
补记·····		(310)



目

录

绪论

我们是如何成为“现代”的

绪
论



我们是如何成为“现代”的

001

近十年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等领域内出现了一股重视、发掘和重新建构中国自身内在传统的学术思潮^[1],在其影响之下,“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这样的论题颇获学界关注。但亦仅止于关注,在众声喧哗之下,真正落到实处“啃”到节骨点上的认真研究却是较为稀见的。能够列数出来的专于此论题的学人尚属空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部分国外学者如夏志清、普实克,九十年代以后的部分国内学者如方锡德、陈平原、李怡、高旭东,虽然都取得了一些实在的成绩,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与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不能相称。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之关系为核心问题的专项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一部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已有的考察与分析大都是在讨论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时部分地涉及到儒家传统,但其论述的比重与力度总不及于佛学传统、道家传统和民间传统。二是即使在这些有限的兼顾研究里,也是发掘自不同的稀见文学期刊、过去未曾公开的私人日记、书信里的文学和思想史料同类论点的反复陈述。此类研究固然在资料的翻新与累积上不失其实证的意义,但其理论建树上的欠缺也必然地决定了它们对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的推进限度。目前这类研究的论点主要集中于儒家忧时救世精神传统之于现代文学意识及文本精

神内涵的渗透与支配上,除此之外,则较少有可以启人心智的见解和论述。这种喧哗之下实则冷清、热闹之下实则停滞的学术局面亟待改变和突破,因为儒家士绅群体的忧患意识自港台学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并加以界定以后^[2],到今天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联实际上已成为公共的大众知识,即便是一个仅阅读过鲁迅或沈从文等有限的几部作品的普通读者,也断然不会把它当成富有价值的文学见识,尽管它的准确性完全缺乏争议。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儒家存在状态及其影响路径,不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就很难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也缺乏源于现实关怀与思想探索的真正乐趣。这必然要求当前的研究者能够在新的精神与技术资源中获取新的“眼光”,敢于也有能力穿透业已公共化的“大众风景”,继续去勘察那些尚未浮出历史地表的学术“矿藏”。本书的尝试与努力即在于此。当然,这里面暗含的富于魅惑力量的挑战使本书难以免除某种冒险的姿态。

但与十年来以新儒家及大陆新兴文化保守主义为代表的、以重构儒家传统为目的的学术潮流并不完全一致的是,本书并不将那种寻求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内某种“传统文学的变革动力”^[3]的思考,作为展开分析之前的一种理论预设,因为我始终信守这样一种看法:学术研究的客观与公正不应当过多地允许事实之外某种文化潮流或意识形态的介入,我们的确需要借鉴新的知识系统与陈述方式,但这种借鉴只能是警惕中的汲取与吸收中的疏离,学术与思想的恰当距离是应当保持的。所以,本书希望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阐释、讨论和陈述儒家思想及其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事实功能及可能的意义,而不预先抱定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儒家质素“重植”“灵根”的主观意愿。儒家思想及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否存在以及怎样存在,它的客观功能和效果,以及我们应当采取的姿态与应对方式,都需要以史实梳理与逻辑分析的结合为基础。有效而深入的“调查”是我们甄别和表述的前提。

第一节 现代文学的文化渊源

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的关联,首先要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确立分析的基础: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如果存在,现代文学就是源出于涵纳儒家质素成分在内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是其自身发展、变革与积极调整的结果吗?

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联是不难确证的。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全盘的反传统主义”的思想倾向,它还被认为曾制造了“文化的怪胎”,但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在言行方面并不否认自己与儒家伦理规范与道德理想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诗人郭沫若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在《新青年》杂志所掀起的排儒反孔的时代大潮之中,他始终坚持对孔子的礼赞态度。当然这只能算是较为个别的案例,但即便是反孔最为厉害的几位新文化主将,与郭沫若实际上也有着声气相通的地方。陈独秀是一边革命,一边要求青年以孔子作为进取不馁的楷模^[4],吴虞一边骂孔子,一边又承认“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5],周作人说得更明确,他直接承认自己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6]。把“全盘西化”喊得最响亮的胡适事后也追忆,“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7],“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8]。在人生操守及道德奉行方面,这批知识分子对儒家伦理价值的认同更是强烈。鲁迅写过婚姻自主的小说,胡适发表过反对包办婚姻的剧本,但他们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却都是谨守母命的,而且鲁迅还为此付出了至痛的代价。吴虞认为人们“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9],最恨“三纲五常”,然而在女儿的婚事上他要坚

持包办到底。所以说,五四知识分子的反儒很大程度上是因于当时的历史要求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得不攻之者,势也”^[10],而他们自己对儒家的某些价值、规范并不失深刻的认同,因此,他们在公共舆论中的激烈表述与他们自己私下对儒学的真实看法往往有明显的差异。这并不奇怪,怪的是五四人丝毫不以此为异。新近披露的钱玄同日记生动记录了五四人在不同的公、私语境中对儒学态度的赫然对立。钱玄同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后至大学访适之,畅谈,甚乐。适之谓自汉至唐之儒学以《孝经》为主,自宋至明以《大学》为主。以《孝经》为主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均因我为我父之子,则不能不做好人,我之身但为我父之附属品而已。此种学说完全没有个‘我’,以《大学》为主,必先正心、修身,然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以我为主者。故陆王心学均能以‘我’为主,如陆九渊所言,我虽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作一个人。此说吾谓最精”^[11]。这是对儒学较为平正、稳健的判断,完全不同于他们在公开言论中的决绝姿态。新文化运动如此,新文学同样也有这一特点。尽管五四文学一开初就以激烈批判传统文学为特点,但这种批判本身却是由儒家忧国救民精神推动的,诸如启蒙、“疗救”、为人生等等告白,就是儒家忧患意识与“文以载道”传统的双重体现。

至于现代文学是否源起于中国文学内部的自发性传统,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非常肯定的看法。在最初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就有研究者提出过五四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自然包括儒家要素)的关系问题。周作人最先倡导此议,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他将五四文学与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联系起来讨论,“(晚明)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的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长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



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工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从此,也更可见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相同的了”。到抗战期间,何其芳也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旧文学底正当的发展。”^[12]这类观点虽在建国以后湮没无闻,但随着九十年代海外“中国中心观”冲荡现代文学研究以后,它很快就被重新发现,并衍生出“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论,后者明确认定现代文学源出于中国自身的传统^[13]。这种观点在近年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虽然脚踏实地的研究实绩仍较缺乏,但作为一种倾向性明确的理论态度,它未经什么争议,就赢得了学界普遍的情感认同。

但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给予慎重的考虑,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西方影响与传统影响是同样存在的,传统文化存在影响显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文学就是源出于传统,就是其自身变革的结果,也不表明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具有主导性的、建构性的力量。但不少研究者因为钟情于传统自身的“剧情主线”,以致于极端地贬斥西方影响,声称“即便没有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也将逐渐衰落,新的传统也将逐步形成”^[14]。这就脱离了基本的文学史事实。实际上在五四以后,周作人那种将现代文学与古典传统联系起来的看法很少有人认同。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就不曾呼应其弟的见解,他认为自己写小说“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15]。胡适写过《终身大事》等重要剧本,他也认为五四戏剧的发展应“采用西洋最近几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16]。郁达夫读过一千多部西洋小说,他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17]。到了三十年代,蒋光赤还是毫不犹豫地认为五四文学是完全模仿西方的结果。四十年代,胡风更明确地坚持把五四文学视为“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18]。甚至到了新时期,见证了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茅盾先生也仍然认为五四文学是以“穷本溯源”的方式“借鉴于西洋”的,“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欧洲……从希腊、

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19]。当然，这不是说周作人的看法完全没有依据。周作人一生嗜好晚明小品，他的观点放在散文范围内也不失一定的道理。但就整个现代文学而言，鲁迅、郁达夫、茅盾等小说家、戏剧家的看法可能更加可靠。就他们的亲身经验与感受而言，没有人表示在西方影响之外存在着某种中国文学内在的自发的“剧情主线”。

这些表明，如果说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对现代文学存在影响，那么西方文化对现代文学可能同样产生了影响，如果不是更多影响的话。那么，现代文学到底源出于哪种文化系统呢，中源论与西源论哪种更为合理呢？

倡扬中国文学自身“剧情主线”的研究者，其最大根据不是文学上的事实而是一种逻辑推论。陈平原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自然必须从那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外来影响只能起刺激和促进的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变革动力应该来自这一文学传统内部。否则，变革不可能获得成功。这对于熟读毛泽东著作，牢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20]。这一意见在学界广为接受，直接推动了有关中源论和自发性传统的研究热潮。但是如果我们对陈平原的论证逻辑细加推敲的话，是可以得出另外的看法的。他所说的外因、内因之主次轻重当然不言而喻，但问题是，在五四以后我们能够简单地把源自西方的知识和价值划归到“外因”的范畴吗？我们知道，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内因，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在幼小时便熟知四书五经，儒道禅文化意识已经化入他们的知识结构与价值系统。但是，如果这些人在青少年时期像熟知四书五经一样，对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也是谙熟于心久受熏染，那么，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把西方断定为“外因”吗？这种方法对于清末民初的知识人来说也许是适合的，因为他们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皆已成年，知识结构与价值系统已经基本定型。但对于五四这一代来说，把“西方”简单归为“外因”就可能不合实情，就是不了解五四一代知识人少年时



期(二十世纪初年)的教育状况了。我们知道,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传统教育方式已随着科举的衰落与废止而大大地式微。这一变化,对全国正处于求知初始阶段的幼童和少年及他们的家庭构成了绝大的冲击,是继续由私塾而书院的方式接受旧式的经学教育,还是放弃传统的经学转向为时势日益看重的新式教育,对很多家庭来说,事关子女和家庭自身前途的抉择。该怎样选择是不难作出决定的,就连小小的少年胡适都能清醒地看到当时教育的走势。他在给母亲的家信中表示,“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21]。在这样的世风转移中,“新学”大张而“旧学”衰微,新式学堂里的学生和老师对“国文”都已不甚重视,水平也自然大为下降。胡适初从安徽乡下考入堂堂有名的上海中国公学时,就发现公学里教师的“国文”水平竟抵不过自己。而此时的胡适也仅是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对“经义”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22]。在这种西学中心化而国学边缘化的新的教育状况下,我们能说“新学”就一定没有化入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液中去,进而成为他们潜意识的一部分吗?应该说,在五四知识分子那里,“新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内因,比如,自由、民主、“人”的尊严等思想,对于鲁迅、胡适等五四人来说,自然也是居于内因的位置,对他们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自然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西方思想在现代文学中也可能起到内因的作用,也可能发挥主导性的影响。所以,从内因、外因的逻辑关系我们其实是推论不出现代文学必源出于传统文化及文学的结论的。中国现代文学,既可能源出于传统,也同样可能源出于西方。所以,那种认为现代文学源出于传统并与西方形成了互动与对话的看法,是缺乏充分证据的,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学界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了彼此呼应的声势。

中源论在事实上缺乏根据,在逻辑上也有很大的漏洞,而五四之际思想和文学的真实状况表明,现代文学主导性的资源来自西方。首先,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已经丧失它作为知识资源、信仰资源的地位。有研究者指出,在五四,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失落是不可挽回的事实,它已丧失作为“政治制度、伦理生活的合法性基础”的地